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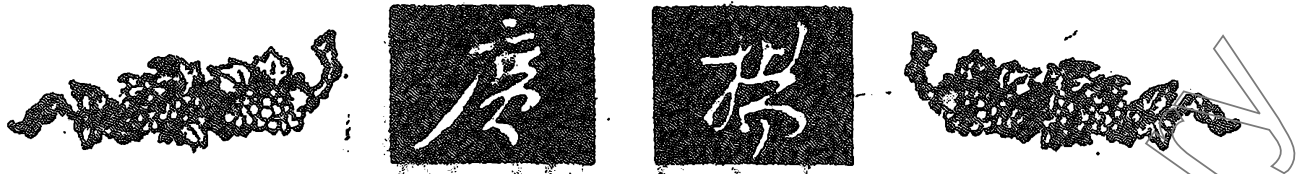
廣 陽

GUANG YANG



7

1960



# 1960年第2期(總第191期)目錄

1960年2月25日出版

中国天主教会与羅馬教廷的关系.....皮漱石(1)

**徹底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的罪行，肅清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

剝开帝国主义者的宗教外衣.....姚正一(12)

义和团运动和“傳教士”.....宋建勳(22)

皮漱石总主教給“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山西罪行”一書所作的序言.....(33)

偉大呀，武鋼！.....邓澤茂(35)

人民公社好得很.....高宗才(38)

蔣伯娘——勤儉持家的能手.....沈鵬軒(40)

封面：养鸡(剪紙).....(新华社稿)

封底：1959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图表.....(新华社稿)

月刊 每月25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

訂閱處：广揚月刊发行課

(天津市和平区西寧道9号)

每册1角 半年6角 全年1元2角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掛号另訂)

# 中国天主教會與 羅馬教廷的關係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 皮漱石  
中國東北教省總主教

梵蒂岡與我們新中國的關係很显然地是敵我關係，它是一貫反蘇反共，尤其反對新中國。解放前，它指揮帝國主義分子們造謠污蔑共產黨；解放後，變本加厲施展各種陰謀手段，利用宗教形式來煽動和蠱惑中國天主教友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祖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站在人民立場來看梵蒂岡與我們的關係，只能有一種看法：“敵我關係”；故此我們應當站穩立場，分清敵我，徹底擺脫它的一切控制，與它斷絕一切關係，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但是我今天不打算多談這種敵我關係問題，因為這是很

显然的事，大家都明白，我僅談一談我們從宗教道理上，對羅馬教宗的“首席”地位當作怎樣的看法，當怎樣對待？就是說羅馬教宗是否真是聖教會的“元首”？我們會一向認為：現在看不見的是天主耶穌，看得見的是接聖伯多祿位的“教化皇”；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和它脫離就是“裂教”，裂了教就不能救靈升天。羅馬統治下的帝國主義分子一貫是這樣講的，我們也是這樣信的。因此一提到與羅馬的關係，便膽戰心寒，避而不談；若說割斷關係，那更是塌天的大禍，永遠的災殃。究其原因，我認為這是對真正道理不明白的原故。信仰對我們

來說是至寶，耶穌的真道理和意旨是信仰的根源；但帝國主義分子們所講的與耶穌的真精神是符合呢，還是相反呢？我個人經過考查和研究，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以前我們所學的羅馬“教宗”，是聖教“元首”，是耶穌所立，是耶穌在世的“代理人”等等，在歷史上、道理上完全沒有根據。羅馬主教由第四世紀開始與封建統治者互相勾結，因當時羅馬是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有信教的帝王支持，逐漸自高自大，形成它的優勢，以致以普世教會的“元首”自居。而處在羅馬較近的教區主教，因着政治勢力的威脅、利誘，不得不对它表示尊崇，並且羅馬城是宗主教，它屬下的主教對它表示服從，也是自然的。故羅馬主教的聖教的“元首”地位，純粹是人為的政治產物。

為從道理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談談耶穌在世是否真的委派過聖伯多祿為宗徒之長，聖教元首。否認聖伯

多祿元首地位不等於小視聖人，我們對聖伯多祿仍是尊敬的，但是歷史是最雄辯，最無情的。如果耶穌真的委任過伯多祿為宗徒之長，接其位者就是聖教“元首”，我們承認羅馬主教為聖教“元首”是對的；如果在聖經、聖傳上找不到合理的根據和事實，而我們偏要盲目的信從，那就是受人之欺，而自己還不肯擺脫他人之欺騙，豈不可惜！

我們遍查聖經，查不到耶穌委任伯多祿為宗徒之長的明文。當然，自羅馬主教自封為聖教會“元首”後，有些神學家們為證明此事，在聖經上也找了几條牽強附會的證據；主要的他們引証了馬豆聖經（16章18節）的記載，在伯多祿明認耶穌為天主子後，耶穌向他說：“你是伯多祿（磐石），我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人們依據這句話，就認為耶穌委任了伯多祿為宗徒之長、聖教會的“元首”。我們如今就把這段聖經研究一下！

第一、“你是磐石……”  
这节聖經仅在馬豆聖經上有，  
其余三位聖史都未提；况且瑪  
尔谷、祿加記述同样事实时，  
仅提到了在伯多祿承認耶穌为  
基多后，耶穌严禁他們不要向  
人告訴，至于“你是磐石”等  
語根本沒有。（馬尔谷8.28；  
祿加9.19）奇怪得很！耶穌如  
果建立伯多祿为教会“元首”，  
理应用明确肯定言語，豈能用  
一个比喻就算确定？我們知道  
聖經是宣傳福音的藍本，教友  
也以此为耶穌真道的根源，委  
派“元首”偌大关系的事，四  
大聖史理应源源本本地詳細記  
載出来供后世人們信仰，然在  
各位聖史所写的聖經上竟然未  
明确地提出。我認为不是不提，  
实在是因为沒有这段历史。

第二、聖經学者們对这段  
聖經的真实性，曾作过研究。  
該文在第一世紀馬豆聖經原抄  
本上也是沒有的，仅在附录上  
添写了这一段，笔法也不一  
致。馬豆写聖經一貫用希伯来

文習用的行文格式，順序排列  
使用并行体，而后添的則不一  
样，故此該文的来历实在可  
疑，想必是后人添上去的。其  
次：根据神学家（Tanqueray  
theol. Dog. I 456）“你是磐  
石，我将在这磐石上……”，  
在亞拉馬依嘎和法文譯本，前  
后两个“磐石”意义相同，而  
在希腊和拉丁譯本，前后兩語  
意义并不一致，也就是說把“  
我将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教会”  
当作委任伯多祿为教会“元  
首”的根据，其意义大有可疑  
之处。聖奧斯定把“磐石”解  
釋为“信德”，这样更談不到  
在信德上建立教会，就等于将  
伯多祿立为教会之长了。

第三、就讓馬豆聖經上果  
有其言，也不足証明耶穌用此  
比喻就肯定委伯多祿为宗徒之  
长、聖教“元首”，因为在四  
大聖史聖經上还找出許多反駁  
的証据来。如馬豆聖經（20章  
17—27节）記載着載伯德儿子  
的母亲求耶穌，将来在天国  
里，叫她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右

边，一个坐在左边……。那时其他十个門徒對他們弟兄爭地位都憤憤不平。而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主統治他們，有官長用權柄管束他們，但你們之間却不可這樣……”。我們來分析一下這段聖經的事實：在耶穌受難前幾天，耶穌知道過幾天就要受難身死，一切事須要安排，如果耶穌真的願意在世上建立一個像國家那樣的組織，在宗徒之中建立一個頭腦，應明文規定一下這是一個很好也很重要的時機；然而，相反的耶穌借此機會僅訓戒了他們當彼此團結，熱心為人服務，對他們爭吵的地位問題，却置之不理。同樣，據馬爾谷聖史（9章32節）記載，在去葛發翁的路途中，宗徒們爭論過他們當中誰為最大。當時耶穌並未指出伯多祿乃宗徒之長，也僅僅勸告了宗徒們當修謙遜。根據以上兩段聖經，證明耶穌呼伯多祿為磐石，並沒有升他為宗徒之長、教會首領的意圖。這却很

顯然地說明耶穌願意十二宗徒都是繼承者，都有同等的權利，傳教到那里，教友多了需要聖主教，就聖一位主教，然後再往他處去傳福音，根本用不着有一位最高統治者來委派批准。

還有人認為，耶穌向伯多祿說：“我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你在地所釋放的，我在天也釋放，……”（馬豆16-14）這就是付給伯多祿管理教會的至高神權。但我們再看一看若望聖經的記載，耶穌在復活後，升天之前，有一次顯示給宗徒們，先向他們吹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吧！”隨給他們說：“你們赦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難道說在這裡耶穌把12位宗徒全立為教會的“元首”，全給了他們“元首”的最高地位么？（若望.20.22）耶穌或給伯多祿鑰匙，或向宗徒們呵氣，全是表明給宗徒們赦罪的權柄，並不意味着授以“元首”地位，否則“你在地下釋放的，我在天也

釋放，就講不通了。

有人为維護伯多祿是宗徒之长，而后世繼其位者是教会“元首”的論点，还引出若望聖經21章15—17节，耶穌三次問伯多祿爱他否一段作証：耶穌給西滿說：若納的儿西滿！你比这些人更爱我么？伯多祿答說：果然，主，你知道我爱你。耶穌說你牧我的羔羊（agnos），連問三次，囑咐他牧羊也是三次，但是最后一次用的是母羊（Oves）；因此有人解釋說羔羊是教友，母羊是神职班，这就是委伯多祿作总牧。我認为这是牽强附会。耶穌連問伯多祿三次爱他否，并囑伯多祿牧他的羊，原因是因为伯多祿曾背主三次，在众人前大坏表样，主为使他加强信爱二德，后勿再犯，并使他当面补贖，挽回恶表，也是教宗徒們知道伯多祿虽然背主三次，但自己仍然信任他，囑咐他牧自己的羊，怎能以此作为立伯多祿为宗徒之长的証据呢？牧羔羊、牧母羊的詞句变

化，那是笔者为了避免詞句重复，乃修詞上的运用，并不見得母羊就是指的神职班，羔羊指的是教友。同一聖史若望也會在10章11—16节記載耶穌善牧的比喻所用的全是“母羊”（Oves）字样，难道說耶穌只是神职班的牧者，而不是教友的牧者么？再者若望聖經21章的真实性尙有疑問；按他写完20章末了时写着：“耶穌在門徒前还行了許多别的聖蹟，沒有記載这書上，这里所記的，只是为叫你們信耶穌是真天主子，叫你們信他，因他的名字得生命”。已作了他全部聖經的結束語，为何又有几乎全章論伯多祿事的21章出現呢？这不能不使我們怀疑它是覆鼎。当时的宗徒們从未承認伯多祿是他們的首領，而一般教友們也未尝把伯多祿当作“元首”对待，宗徒行实11章記載：因为伯多祿进不割損的人家去，和他們吃飯一齐生活，割損的門徒就狠狠地批評他。而伯多祿并未以首长的身分出現，严



正訓諭大家，仅仅作了简单的解释。在选馬弟亞为宗徒的过程中；伯多祿只作了选举的建议，而实际先由大家推选出两位候选人，再由候选人抽签选出。（宗徒行实，1.23）如果伯多祿真的乃教会“元首”，为什么他不以“元首”的身分直接委派或施行批准呢？

再看看聖保祿宗徒是以怎样的身分来对待伯多祿。在保祿致加拉达書信中（第2章6—15节）記載着，因伯多祿怕割損的奉教人猜疑，躲避与外邦奉教人一同生活，保祿很严肃的責斥了伯多祿一番。保祿在信中說：“那时在人心目中为教会柱石的就是雅各伯、則法、（伯多祿）若望……，后来則法到了安底約基，因为他有应受申斥的地方，我就当面反抗了他”。由聖保祿所說的話可以看出，当时在小亞細亞地区的人們，認為聖教柱石的不只是則法个人，而是雅各伯、則法、若望三人；保祿先提雅各伯，次則法。再保祿責

斥則法說：“你这为如德亞人的”。而不說：“你这作为教首的”。

还有人引用保祿致加拉达書1章18节：“过了三年我才上日路撒冷去，見到則法在那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宗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外，我没看見一个”。解釋为保祿曾由主亲召，但仍需要去日路撒冷見則法請求追認，因为他是耶穌簡派的“元首”。我認為这样解釋法是断章取意，因为若由15节讀起：“天主把他聖子显示于我心中，为叫我傳播他的福音于外邦人，我并没有同血肉商量，也没有去日路撒冷去見那些先我作宗徒的人，立刻就往阿拉伯去了，过了三年才上日路撒冷，在那住十五天”。我們便知道聖保祿是告訴教友，他講道傳教是由耶穌亲授的，并未有向别的宗徒學習，或接受他們的委派（連伯多祿在內），因为十五天能学什么？况且保祿去日路撒冷以前已傳道三年了。从此可知保祿

去日路撒冷同伯多祿相遇乃是偶然之事，絲毫找不出保祿承認伯多祿是教會“元首”的痕跡來。如看看“宗徒行實”記載同樣事，更清楚了，（宗徒行實26-29）。

我們再由聖傳上研究一下，三、四世紀任何教父所寫的著述和言論，從未提過羅馬城主教是聖教的“元首”，只稱他為羅馬主教，或宗主教。在前五個公議會中，每提到羅馬，都以羅馬主教稱之。這五個公議會中，他的代表出席會議也是以羅馬主教代表資格出現，召集公議會的是皇帝，主持會議的主席和副主席也是由皇上任命，末後批准者還是皇帝。簽字時，羅馬代表和其他參加會議者享受同樣權利；當時在大家心目中，並未有承認羅馬主教是教會“元首”。

或者有人說：日路撒冷第一次會議，也足以證明伯多祿是教會“元首”，因為在會議上則法發言後，群眾全服貼。如果我們把會議的促成、時間、內容

和決議仔細研究分析一下，不難看出，並不是那麼回事。據“宗徒行實”15章所記載：“有幾個從如達下來的人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遵守梅瑟的規矩割損，不能自救。保祿和巴爾納伯與他們意見不合，大起紛爭；於是眾議決定叫保祿和巴爾納伯，並他們當中幾個人一齊上日路撒冷去見宗徒長老……。宗徒及長老們就召集會議審查這件事”可見會議的促成和召集者是保祿和巴爾納伯及宗徒長老們，並未提過伯多祿之名。會議時間約在耶穌升天后20年上，在京都的宗徒有雅各伯（日路撒冷主教）有若望，有伯多祿，和長老們。（長老們是指有主教權的人）當時伯多祿來日路撒冷是避難，因為羅馬與皇帝格洛底約下逐客令，伯多祿不得不離開羅馬回國避難，因此巧逢此會。會議上因意見分歧，辯論不休，伯多祿就把他在神靈超拔中聽見天上的聲音指示他收外邦人入教的事蹟述說了一

遍，末后說：“既是这样为什么如今还要試探天主呢？”众人知道了收外邦人入教，是天主所启示，若再爭論就是試探天主，违背主旨，因此大家再不爭論。待巴尔納伯和保祿發言后，雅各伯就說：“众位弟兄請听我言，依我的意見，凡外邦人回头归主的，不要难为他們，只写信囑咐他們，戒偶像的污秽，戒奸淫，戒悶死的禽兽，戒血就行了”。雅各伯作决定后，宗徒及长老并閤聖教会都同意認為很对。于是从他們中拣选几位，打發他們同巴尔納伯、保祿去傳達會議的決議。由日路撒冷會議整个过程来看，主持會議以及作最后决定的，全是日路撒冷主教雅各伯，伯多祿和保祿。巴尔納伯只不过以参加會議的身分，闡述个人的看法和見解而已。故此說，伯多祿曾以教会“元首”的名义来日路撒冷主持了第一次大公議會，是不符合客觀事实的。

此外，我还有一种看法，

在聖教初兴时，教会中心理应是日路撒冷，而不是羅馬，事实也証明这一点。“宗徒行实”說的很清楚，宗徒或門徒到四方去傳福音，回到日路撒冷来匯报；有問題来日路撒冷来解决（日路撒冷大公議會就是现实的一个例子）；有捐獻都送到日路撒冷再行分配；就是伯多祿到四方去傳福音也到日路撒冷来匯报。按理而論，如果伯多祿是教长，他应經常住在教会中心日路撒冷指揮全面。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住在日路撒冷坐鎮的不是伯多祿而是雅各伯。按耶穌升天后，宗徒到各处去傳教，并不是由伯多祿和某宗徒派遣，而是由宗徒們拈鬮分配的；（聖經上虽未有这样記載，但根据宗徒傳記，巴尔多祿茂、馬豆、安德肋，都是这样分得傳教区域的）。可見宗徒們同样都是耶穌的繼承人，按耶穌的意旨及教会的真正傳統，他們的职权全是平等，同样遵从耶穌的聖訓到四方傳教，建立自己的教

区，并没有你尊我卑的分别，但恐怕有人說，聖教是至一的，如果没有一个至上者领导，道理不是不能一致了嗎？我認为耶穌道理的总綱是天主十誡，和信經十二端，聖教会道理的根源是聖經和聖傳；我們都依据十誡、信經、聖傳，来专务事主救灵的事情，既有共同的目的又有一致的信仰原則，还怕什么不一致呢？我們現下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聖的正义行动归根到宗徒們的傳統，根本没有什么裂教、不一致可言。

有人說：“羅馬教廷首席地位”是經大公議會規定的信條，必須堅信無疑。我對這個問題是這樣体会的：公議會所規定的信條是否都該嚴格堅信，首先須要明確它是否出自聖經或聖傳，有无政治或其他背景。如果聖經或聖傳上沒有明文証實，而且是由政治或其他人為背景造成的，這種道理顯然不是天主顯示的，也就不能當作信條對待。為了証明這

個道理，我舉出幾個大公議会的例子向大家談一談。教会中公認的二十次大公議会的規定，其重要性和約束力仅次于聖經，如此再從公議會的情況看看教宗的“首席”地位問題。

第一次公議會——尼賽公議會(325)是君士坦丁大帝所召集，參與會議的有318位主教神父，包括安地約基、亞力山大、耶路撒冷、羅馬和西班牙各地主教，皇帝居中高坐，坐在大帝右邊第一位主教是安地約基主教艾尤斯大德，是他向皇帝致祝詞，羅馬主教方面，仅有一个代表在坐，也仅是听之唯唯而已。

第二次公議會——君士坦丁堡公議會(381)規定君士坦丁堡主教在羅馬主教后享有首席榮譽，理由是首都主教，首席与否是以首都決定。

第四次公議會——加爾各答公議會(451)在28法條中重申君士坦丁堡公議會，給予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權利“教父們

有理由給与旧羅馬城聖座这些特权，因为是首都，而以同样动机 150 名主教决定新羅馬主教因国家和會議院的榮耀，应有同等权力”。这一規定与会的人都一致通过。

第八次公議會——第四次君士坦丁堡公議會(869—870) 32 条規定“召开公議会的权力屬於五位宗主教，应受到全世界的尊敬，首先是羅馬宗主教”。“主教若被总主教革职后，可上訴宗主教”，无上訴羅馬宗主教字样。皇帝欽差在講話中說得更明显：“天主建立教会是在五位宗主教的座位上，他們是永不会倒的，若有两个倒下去，人們将投奔其他三个，若有三个倒，則投其他二者，若四个倒下去，剩下的一个将会喚起教会”規定中虽特提到“受尊敬首先是羅馬宗主教”一句，这显然是荣誉不是权力，因为“教会建立在五位宗主教座上”，权力是平等的。

由五世紀至十五世紀，十

个世紀中經過十几个公議會，羅馬主教在爭奪首席地位上总是層出不窮不遺余力的；其中首推良一世(440—461)額我略一世(590—604)和額我略七世(1073—1085)为最甚。但是总未能大功告成，待十五世紀的佛罗倫斯公議會——第十七次公議會(1438—1439)才勉强确定。这次公議會是教皇欧司尼在希腊皇帝巴萊約勞和某些公侯伯爵等支持下召开的，出席會議的只有总主教五人，主教十八人，院长十人，包括教皇皇帝貴族神职人員仅有160名。它不足以代表全教会，可想而知。決議虽宣布了，但仍不是信条，既不是信条，服从与否在信仰上各有自决权力。又經過四个世紀到1870年的梵蒂岡公議會才硬性的定为信条。如今就以1870年的梵蒂岡公議會的情况来看，对教宗“首席”地位，普世教会主教們并未認為它是耶穌亲立的。参加这次公議会的有700名主教、神父，在會議中一提出教宗

“首席”，尤其教宗不能錯，要定为信条时，立时引起了会內的震惊，与会的人們展开了極激烈的爭辯；在会外有来自奥国政府的抗議書，有来自法国政府的反对备忘录，普魯士因正准备战争，首相声明“保留权”等等。另外还有来自他处的小册子，“揭發公議会用粗暴卑鄙手段强迫人們通过他們不同意的事情”，指責会內沒有討論的自由，鼓励反对派要坚定立場，勇敢地說“不贊成”，爭辯一个月后，仍无結論，主持會議的枢机主教，便下令結束辯論，要求通过。在辯論期間，已有70名主教退出了羅馬，第一次交大会通过那天，只剩下601名。有451名通过，62名有条件通过，88名不予通过，此时普法战争序幕已开，兩派主教都急于返回教区，反对派主教絕大多数已离开羅馬。1870年7月18日即普法战争前一天，庇护九世主持大会，要求通过“教宗首席不能錯”为信条道理。在此人心恐慌不安，归心似箭的当儿，与会人員剩下了435；名然在

通过时，犹有二人反对。接着公議會便宣布“教宗首席地位和不能錯为信条”。如果耶穌在世时，真的明文委任伯多祿为“教首”，接其位者即是教会“首席”，那能弄得这样烏烟瘴气！这样草率勉强未經大家同意而定的信条，怎能叫人信服呢？綜合上述，我認為羅馬教宗是教会“元首”的道理，既不是耶穌的旨意，也不是聖教會的傳統，完全是一个政治产物；我們中国天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摆脱它的一切控制，是符合耶穌真精神的措施，是实际执行了中国天主教友应享的权利。今后我們大家对羅馬教廷既有了新的認識，应当徹底扭轉以前对它的錯誤看法和盲目的崇拜，要站稳人民立場与反动的梵蒂岡坚决斗争到底，与它割断一切关系，否認它的一切；并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安心办好独立自主的中国天主教会，为祖国貢獻出一切力量。以上仅是我个人的理解，請大家研究分析，并加指正。

# 徹底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的 罪行，肅清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

編者按：徹底揭露批判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的罪行和在全體神長、教友中徹底、干淨、全部地肅清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仍是當前反愛國運動的主要任務。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的罪行是很多的，但是由於過去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穿起袈裟，長期對我們進行奴化教育，所以有些受其迷惑較深的人至今對那些妖魔的本來面目還認識不清，甚至還有迷信和幻想。因此徹底肅清帝國主義思想毒素的影響，還須進行長時間的努力。

去年有些地方的愛國會，組織神長、教友進行了搜集帝國主義罪証揭露帝國主義罪行的工作。這是一件很有政治教育意義的好事，對於清除帝國主義的毒素，啟發我們的愛國主義覺悟很有益處。山西省天主教友愛國會已把該省神職人員揭發帝國主義“傳教士”侵犯山西的罪行的文章輯印成書，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皮漱石總主教給該書寫了“序言”。本刊本期開辟的徹底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的罪行，肅清帝國的政治思想影響的專欄，選登了山西省的兩篇文章及皮總主教的序言，以後還將陸續刊登這類文章。我們希望各地神長、教友也積極行動起來，大力蒐集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修會及醫院、學校等等所謂“宗教慈善事業”機構侵略我國的罪行，撰文寄本刊發表，以便互相勗勉，共同提高，為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而鬥爭。

## 剝開帝國主義者的宗教外衣

山西大同教區神父 姚正一

帝國主義分子們所標榜的“超政治”、“超階級”的謊言，本來是明若觀火路人皆知的，然而，一直有些人被帝國主義分子們蒙蔽得皂白不分，把那些披着黑色道袍的帝國主義分子，看做是為了傳揚基多聖教的“福音使者”。豈

知，在“福音使者”的神聖外衣下，暗藏着一付令人毛髮悚然的猙獰面目。象那些臭名昭彰，人所共知的特務間諜首領們：雷鳴遠、雷震遠、于斌、毛振翔之流，都是專門搜集我國各種重要情報，供給帝國主義的。一些外國“傳教士”們，也都是忠心耿耿為殖民主義者充作開路先鋒的。現在僅就我的一點見聞，把帝國主義分子們在我省的特務間諜活動公諸大家，供參考。

### 一、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

有人認為傳教士初入中國時，並沒有什麼政治野心、特務活動，後來日久年長，人數增多，受了各帝國主義的多方利誘，不免陷入了政治的泥沼。然而，事實勝於雄辯；讓歷史事實來給我們解決這一疑案吧。

早在一百多年前，當帝國主義向中國伸出他們魔爪的初期，“傳教士”的貢獻已為各帝國主義所認識了。法國侵略

軍官蒙托在1860年10月中，給他們的司令官勞爾東的信中這樣說過：“我們在中国的勢力是全部以天主教士作為基礎的，我以前早已說過，我們在這個廣大國土上發展勢力的最可靠的手段，是在我們的那些天主教傳教士們手里”（“傳教士為誰服務”24頁，1912年巴黎版）。現在僅從山西省教區的第三主教江美斯，來看一下帝國主義的“傳教士”們究竟在於着什麼勾當：江美斯，意大利人，1840年10月30日到達澳門，當時澳門雖屬葡萄牙國，然而，其他各帝國主義國家，象英、法、意等，都設有辦事處，這些辦事處純系國家機構。在教會方面，如方濟各會、味增爵會、多明我會等也都設有他們自己的辦事處，專門招待那些由西歐來東亞，或由東亞被驅逐出境的“傳教士”，同時“國家與修會的辦事處在工作及情報方面保持密切聯繫”（林著江美斯傳）。江來澳門之後，通過法國辦事處內走卒



的护送，于深更夜半登舟暗暗通过关卡。之后，藏于走卒的家乡，当夜由三十余名教友携带武器护送到安全地带。这些走卒与当地教友都定有暗号：夜间敲门时说：“你们是基利斯当么？”对方回答是者，始可接头办事”（林著江类斯传）。当时海禁森严，帝国主义“传教士”们通过这种间谍式的走私，偷越国境，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他们潜伏中国各地，从事着情报工作：“各省潜藏的传教士很多，通过走卒与外国来往一切信件”（林著江类斯传）。“方主教常住西安，遣使走卒往返广东送信取款，此事非常机密”（林著山陕传教史，44页）。1858年，江报告“传信部”说：“由于英法干涉，我们获得了传教自由，但希望英、俄、法、美、联合起来，将会使我们获得更大更多之自由”。1860年，在他给姪子罗基纳的信中说：“整个中国盗匪群起，叛变扰乱，烧杀抢掠，无处无之”。

1867年，11月30日又给他姪子致信：“中国内乱不息，商业完全倒闭，欧洲商人凡是不愿破产或饿死者，皆已回国，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不利。今岁元月特别寒冷，黄河结冰，叛匪趁机渡河，侵入山西南部，……西部匪民叛乱，有席卷山西的危险”（以上均见林著江类斯传）。仅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帝国主义传“教士”们来中国的真正目的何在。正由于此，江类斯在1867年9月2日才获得了意国政府授予的“意大利王国的宣传者”的奖状。这也不难懂得，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极端仇视天主教的德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动者威廉二世却会说出这样的话：“宗教和传教士都是我们在东方国家的商业财富和国家地位的最有力的创造者”。根本不信宗教的法国总统蒂爱尔也说：“法国要在世界上再露头角，必须有对外政策，这个政策并非别的，就是天主教的政策，法国

只有依靠天主教势力，从中吸取力量并加以保护，才能向外发出其光辉。”这岂不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最露骨的供词吗？

## 二、“傳教士”們干着形形色色的間諜活动

帝国主义分子們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进行着形形色色的間諜活动，他們的方法簡直是无奇不有，无孔不入；他們大而至于各地的地形地理，矿山产物，小至人民群众的瑣碎細事，无不搜集。当然，帝国主义分子向外作的情报，不讓我們得知其詳，他們不会把情报的样本保留下来讓我們来一次大清算，但仅从我們耳聞目睹的一些事实中足以認識他們的真面目了。

帝国主义傳教士們几乎是每人一架摄影机，在“游覽留念”的美名下，拍摄我們的险要地形。我讀書时，曾見到大同教区的“傳教士”，把橫跨阳高、大同、广灵与渾源四县的阴山主要路口（石門峪、火石

岭口）都拍成了照片。当“七七”事变战争吃紧之时，中国军队正在朔县修筑城防工事，一个德籍“傳教士”曾偷偷进行拍照。誰都知道，任何国家的軍事建筑，是严禁任何人拍制照片的，但是他們别有用心，明知这是不可告人的勾当，才鬼鬼祟祟的偷拍。山东济南的一个黄乐施“教士”由于致力于搜集中国国防照片寄送美国而致富。他曾利用了国籍司鐸张敬一拍摄了山西兵工厂。1941年，比籍教士石厚德借比賽拍照技术之机，踏遍了整个山西与內蒙，仅內蒙一行，所拍膠板足足裝滿了兩大皮箱，这很难使人相信一个拍照的技术的比賽竟会用到如斯多的照片？

晋北地区的德籍傳教士，竟以避暑为名，在五寨山上的森林中修盖房舍，勾結了一批外国人象美国人、奥地利人来游猎，同时葛尔輯（德国人）又大量地搜集朔县、五寨一带的动植物，制成标本寄往德国。长治一带的荷蘭帝国主义

分子也以避暑为名到处拍照、繪圖，同样寄往荷蘭。更使人奇怪的是为避暑研究而制的标本、拍照、繪圖又都尽数地寄往他們的国家，这究竟是供誰研究？葛尔輯所繪制的朔县教区的晋北13县地圖，是如斯的精确細致，竟使侵华的日寇另眼相看，用做了这一地带的藍本。这些人的居心何在呢，只要讀者略加思考，便不难得出結論。

“七七”事变前，以“天津北疆博物館”館长名义而自居的法籍教士桑志华，曾来我省一行，几乎踏遍了我省的城鎮乡野，山地丘陵，所收集的矿石、动物、植物标本，填滿了几大箱。他到长治一带，在荷籍教士衛真理的协助下，曾进行了相当长时期的挖掘，在武乡县搜出的千余年的化石、象牙，携裹而去。日寇占領期間，在大同教区傳教的比籍教士賀登高，也曾在阳高一带进行过挖掘，甚而挖掘古蹟。象这一类的事例，在其它地区也

不会沒有。这些行为如沒有傳教外衣的掩护怎能进行呢？象那些以募捐、观尝为名，而搜集我国文物作品的行动，更是外籍教士們的特技。北京方济堂所收集之中国繪画竟达数百箱之多，解放后，尚存有将近百余箱的繪画未曾运走，当那些帝国主义教士們回国之时，还想冒充行囊企圖带出中国。太原教区主教鳳朝瑞竟以献礼为名，制做了一套清代社会風俗人物的木刻运到羅馬。长治教区主教苗其秀专门收集我国的各种报纸，成箱地运往国外。由此看来，他們来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明若观火了。

当帝国主义公然侵略中国之际，这些假善欺人的外籍教士們就更露出了他們的本来面目，間諜的本相便暴露无遺了。日寇侵占我国时，外籍教士們与之結成了狐朋狗友，替日本人效劳。当时太原教区的意籍主教李路嘉便命令乡村駐堂的神父搜集各种情报。意籍教士罗希勾結日寇宪兵队，为

了配合日寇的大掃蕩，竟大言不慚地向國籍司鐸張平刺探游擊隊的活動地區，以利日寇出動。解放戰爭時，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更形猖獗了：李路嘉於1949年5月，特派專人給天津方濟堂柏納青送情報，並請柏刺探天津市的經濟情況，轉告與他。又令吳伯祿偷架收音機，專門偷聽國外的反共廣播，以助其造謠惑眾。同時李路嘉親自出馬，以進監給犯人講道為名，刺探當時監獄中之情況及被拘押人的思想動態。意籍傳教士藍納在五台一帶，拍照了當地的險要地形，寄送美軍，深得美軍賞識，施以巨額的活動費。對這一點，連帝國主義分子本身也是承認的。荷籍教士高一鳴，1941年，在日寇召開的“上黨道尹公署”會議上，就公開承認外籍教士經常向本國提供中國情報。難怪有個法國軍官說：“這不僅是幾個單純的傳教士，這應該說是一支軍隊”（“傳教士為誰服務”35頁）。

### 三、間諜活動的組織

帝國主義傳教士們，為了充實力量，更好地利用中國人來助紂為虐，在各地都組織了形形色色的情報網。以什麼“敬禮聖母”名義而成立的全國性的特務組織“聖母軍”已經是路人皆知的事了。“七七”事變，國際特務雷鳴遠在長治武鄉組織“天主教十字軍”即“華北戰地督導團”，駐紮在長治南天貢一帶，搶掠壓迫農民，迄今猶為當地人民切齒痛恨。1946年，雷震遠來太原一行，會見閻匪，計劃成立武裝特務組織“民眾建國協進會”，並在太原召集了許多教友，多次集會密謀。又派特務分子李廣和往長治招募教友參加，並奔走長治教區組織神職人員充當隨營司鐸。1947年，太原教區蔡樂升在太原青年教友中組織“公教青年協進會”，收羅男女青年教友充其走卒。1949年，大同教區比籍教士鄧惠普在大同育英中學（現大同市立二中）成立“革

命重建会”，誘騙青年学生收集情报，打击进步同学，扰乱学校秩序，更在青年教友中，造謠生事，煽动反共情緒，并且企圖暗杀校长，夺取槍支。帝国主义口口声声說什么神职人員不能过問政治，但他們却是特务組織的組織者，搞最阴险的秘密政治活动。1949年，内蒙集宁的国籍司鐸、軍統特务許德逃到大同，受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优待，并且委之以重任——育英中学校长之职，专门在校中搞所謂“肃伪”工作，而且由于与閻匪勾結有功，帝国主义分子范普厚特以一輛斐力普牌自行車相酬。凡此种种，梵蒂岡及帝国主义分子們不仅不給“絕罰”又无禁令宣示，而且贈以“厚酬”，或委之重任，以示其首肯贊許之誠。

#### 四、宗教形式下的間諜活動

帝国主义“傳教士”們既然怀着鬼胎踏上了我国的領土，当然为了达到其刺探、搜集情

报之目的，是不惜任何手法的，所謂的“宗教性質的来往”，更成了他們遞送情报的妙法，因为这不仅掩飾了他們的丑恶面目，而且更进一層使他們的間諜活动合法化。1895年荷蘭“傳教士”賀广才（后为长治区主教）給羅馬的报告中說：“中日战争（指甲午战争）不仅对我们无害，而且頗为有益，因为从此战役可以証实，反抗西欧的情緒不过是一种幻想。”我們再看几节方济各会傳教实录上所載的报告吧：1891年的报告中載“陝南东邻山脉，西以黃河为界，居民六百万，教友一万二千人；山西則北以长城为关，东接直隸，南界陝南，西有黃河，山西气候，經常刮風，居民六百万，皆說中国話，居民不習外語”。1900年的报告中說：“中国除却本土而外；尚包括滿州，蒙古，西藏，居民四亿四千九百万人，本土划分十八行省，居民三亿零三百卅万人”。1895年江类斯的报告中有：“我曾

視查了与晉北教区交界地区，此地皆峻山丘陵，河槽溝道，并无一片平原，山上很难找到一条羊腸小道，虽稍有肥沃之地，但皆种植鴉片。”那些潛入西藏的“傳教士”們更穿起了佛徒的服裝，扮作香客，將我們常用的念珠改成一百顆，每走百步便按珠一顆，按滿一串便是万步，用来暗測路中距离。正象法国的巴果所說：“我从法国动身的时候，仅仅是依据了在察隅（位昌都地区东南——編者）的傳教士蒙貝格寄給我的指示”（“叛变的西藏”，15頁）。同时呢，这些帝国主义的开路先鋒們也深深受到了他們国家的奖励，法国首任駐沪領事就曾向法国殖民部呈报：

“我們所有的优秀的傳教士們都一致爭先恐后，尽一切力量来支援我們”。因此他推荐說：“这些人的工作已获得奖励的資格”。帝国主义的亲口供詞，就是作了帝国主义“傳教士”的犯罪的鉄証。

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傳

教士”們对于这项工作更是不遺余力，晋北大同教区的“宗座总理”比籍教士范普厚，自1946年，前往美国，通过一位杰木斯（譯音）神父的引荐，得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馬歇尔会見，接受了馬歇尔的反共指示和为他編的代号。1947年，他携带大量活动經費返回教区，以育英中学为据点，进行反共；大力拉攏青年，以充后备力量。1950年，被提升为“宗座总理”之后，更进一步把教区参議會一变而成其間諜活动之机构，并通过黎培里向美国遞送了晋北地区解放后有关政治經濟、农村武装力量等情报数次。这些，我們可以从帝国主义分子范普厚及邓惠普的亲笔供詞中詳細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傳教士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竟不惜把至聖教会的組織，作为他們的罪恶窠巢，讓我們的教会蒙受了难忍的恥辱。誠如耶穌基督所說：“我父的聖殿，是祈禱的場所，你們竟把他变作賊窩。”

今天我們覺醒过来的神长教友們，把这些作踐教會侮辱天主的法利賽徒清洗出去，無疑是純潔和衛護了教會。

### 五、“傳教士”的自供

帝國主義“傳教士”們的間諜活動，在中國人民面前固然鬼鬼祟祟，藏頭隱面，深恐被人發覺，但在其主子前面，為了博得青睞，不免要夸功炫耀的。一個西班牙“教士”說過：“當地居民之所以反對教士者，並非由於宗教，而是由於他們是外國間諜。”華定古在他給西班牙王斐利伯的上書中，曾大言不慚地替他的方濟各會士吹噓間諜工作的成就：“在印度各地的方濟各會管轄地區，簡直是極可靠的軍事據點。教士們就是最先鋒的偵察隊，帶回了從來無人獲得過的偵察果實。在東西印度那些會士充任主教的地帶，終究將成為陛下花冠上的一顆明珠”（“方濟各會年鑑”，15期序言）。這還不是赤裸裸的供詞嗎！華定古公認不諱地告訴了我們：“傳教士”的

成績就是偵察出來的情報，企圖使印度併入西班牙帝國主義者的版圖。朔縣教區德籍教士韓鐸民所著的“朔縣教區傳教志”中，除詳述晉北山河地理、礦山產物、風土人情外，尚有如下的論調：“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可惜人民懦弱無能，如果德國擁有中國的天然物資，則任何國家，不是德國之對手。中國如果由德人來領導，將可走上富強之道。“中華民族富有同化能力，如果不嚴加防止，幾百年後，不費一槍一彈，西伯利亞之廣大土地，將要併入中國版圖”。韓鐸民著作朔縣教史的意圖顯然是煽動德國軍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韓鐸民之論調，使我們看到了德籍“教士”所以要搜集晉北之地理產物、氣象變化的答案了。他們所謂的“研究”，不過是供德國軍國主義者研究耳。那麼這邦“教士”不是間諜又是什麼呢？

隨着全國人民的解放，我

們天主教友，也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絕大多數的神长和教友已經能够深明大义，分別是非了。但是，可惜在我們的广大教友中，仍有少数，不能明辨是非，对梵蒂岡及帝国主义分子們存有幻想。

我們再次向他們提起忠告，击起警鐘，不要再受他們伪善的欺騙了。讓我們全国爱国的神长教友們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踏步地向着反帝爱国的光明大道前进！

**編者按：**1900年在我国发生的一个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到今年整整六十年了。偉大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虽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并在帝国主义八国联軍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却一直閃爍着我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热爱祖国的正义光芒。

帝国主义镇压了义和团反帝斗争，逼令腐敗的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后，許多洋鬼子“傳教士”踏着无数中国人民的鮮血，深入到祖国各地，藉所謂“傳教事业”为名，进一步扩张了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經濟侵略。帝国主义为了扑灭我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奴化中国天主教徒，开脫帝国主义洗劫中国人民的罪責，同中国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相勾結，对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正义事业倍加歪曲、誹謗、咒罵与誣蔑。在我中国天主教內，有些忘本的洋奴，亦卖国求荣，不惜扯天下之大谎，顛倒黑白，为帝国主义帮腔，在我們天主教徒中极力制造对义和团的仇恨。这种惡毒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我們不少神长、教友中瀰漫散布着。現在，我們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經日益强大起来了。我們教內广大教友和神长的爱国觉悟也空前提高了，那些尚处在帝国主义反动政治思想影响下昏迷着的人，应该彻底醒悟了！

为了揭露洋鬼子“傳教士”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惡，使我广大神长教友辨明是非，提高爱国主义觉悟，我們在下面发表了“义和团运动和‘傳教士’”，一篇史略性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揭露了帝国主义“傳教士”在山西所犯下的一些罪行，而帝国主义“傳教士”鉄蹄踐踏的祖国其他地方的血迹尚不能托出。为了清算帝国主义的罪債，望各地神长、教友一致行动起来，积极蒐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証，热烈投稿，彻底揭发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肃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思想影响。



# 义和团运动和“傳教士”

山西太原教区神父 宋建助

义和团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我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再繼續忍受下去的时候起来的。由于在这个运动中，中国天主教，尤其是山西天主教成了反帝的直接目标，因而帝国主义者們，就乘机在教徒当中撒下了仇視义和团和教外人士的恶毒种籽，使教徒多年来一直誤認义和团是搞什么“教难”的“拳匪”，从而对义和团和教外人士表示了極大的仇恨，这样在教徒和非教徒之間，造下了一道鴻溝，多年来不能合作，甚至自相矛盾。現在是中国人民大团結的时代，是共同携手建設社会主义祖国的时代，因此所有过去的任何隔閡，应当徹底消除，这也就有必要使多年来受欺騙的教徒对义和团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認識；同时更有

必要使教徒認識帝国主义“傳教士”的真正面目，从而促使我們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因此，我把义和团的本質和运动的起源与“傳教士”对运动的态度以及他們在义和团失敗后的更加蛮橫的罪恶，扼要的介紹如下：

## (一) 義和團的起因和本質

义和团是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一种正义的政治性組織，对这一点就連仇視义和团的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能否認。如傳教士林茂才在他編写的“山陝傳教史”114頁中說：“义和团初期是純屬反对欧洲人的政治性的人民組織。“这个組織的目的是为了扶植滿清不被欧洲人所瓜分。”当1899年“傳教士”安治太（山东主教）拆毀孔庙盖起了教堂之后，当地人民不服，起来反抗，当即得到山

东巡撫毓賢的支持，而西太后又上諭公开把保护国家的权力委托給这个組織”（林茂才著“致命录”，7頁）。当时参加义和团运动的群众比之“天津教案”时更为踊躍，也更为热烈。义和团运动，当然和清廷的腐敗有关，但主要的原因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自从1842年“南京条約”訂立以后，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向我国进攻，其主要的工具，就是以天主教为前哨，外国教士为先锋，如在“方济各会大事录”58頁內說：

“在今天的日子里，对外方人关闭了多年的天府之国，竟然給欧洲人开放，这是由于傳教士領路而取得的自由”；至于中国教徒中的一些败类又往往为外国“教士”作帮凶，因此激怒各地人民普遍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所办的教会，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等是。从此反对外国“教士”的情緒，便不可遏止。繼而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大有瓜分我国的野心，而外国教

士却是得意洋洋，如晋南教区主教賀广才于1895年3月1日給羅馬写的报告中說：“首先值得提到的，就是‘中日战争’，它不只对我们沒有損失，而且为我们有益，从这次战争看来，反对欧洲人的情緒，已成为幻想”。外国教士就在認為对他们“有益”的情况下，到处在城市和乡村里，干着欺騙、掠夺的等等罪恶勾当。总的說来，他們的罪恶有以下几点：

第一，勾結帝国主义領事，干涉我国內政侵犯我国主权：1887年，艾士杰(主教)为了更容易地掌握我国內部情况曾阴谋保举教徒参加国家考試。艾曾数次給法国領事写信要求协助，繼而又派富方济各(神父)亲往北京法領事館办理，通过法国領事館給清朝政府的兩次照会，終于实现了保送教徒入考的要求。对此富方济各竟得意洋洋地說：“法国保教权不只能保护天主教，而且还可以保举教友入考，找闊气职

务。（見“大事录”1888年，75頁）。1894年澤州府因外国教士横行霸道被地方官驅逐案，晋南教区主教賀广才通过太原“艾主教在高级官員前的权威，将该地方官撤职問罪”（“大事录”1895年，290頁）。以教士的身份干涉中国的考試和撤換地方官，这怎能使人不痛恨呢？

第二，霸占田产：法国教士德拉馬在“中法北京条約”訂立之后，曾在中文中私自添入了：“任法国傳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从此来华的傳教士便都冒充法国人在各地强占民房民地，甚至把居民所尊重的庙宇折毀盖了天主堂。如1895年3月13日，晋南教区賀广才給羅馬的报告中說：“在法国保教权的保护下，外国教士完全同中国人一样可以在中国置房买地，并且在魔象毀灭了的庙宇中建起了天主聖堂”（“大事录”1895年，231頁）。1881年2月27日，太原主教艾士杰在給羅

馬写的报告中也同样地說：“在一个三十多戶的村子里，把最近給邪神修盖的新庙一变而为天主聖堂”（“大事录”1882年，126頁）。又如，长治天主堂的田产登記簿殘本記載着从1859年到1911年共进田产一百一十七份，其中买的八十三份，典的八份，献的十七份，讓的五份，換的、罰的、补足、布施各一份。罰、讓、献都是霸占，买、典同样近于霸占，因为买典价非常便宜。1863年所买的一所院（编号十二号），仅一千八百文。这些田产“既不过割，又不輸粮”，把田賦完全轉嫁在农民身上。在117份田产中，只有3份有田粮，总記不过三斗，錢150文，銀四錢九分二厘而已”。（范文瀾“近代史”336頁）。

第三，包攬詞訟：“教民若有戶婚田亩詞訟，都由教士出面說情，教徒犯罪，被官关押，外国教士硬請釋放”（“近代史”337頁）。襄陵县曾有某教友，因犯罪被判死刑，

已呈报上级批示，而荷籍教士竟说是欺压教友，强迫县知事将呈文和原判收回，改判无罪释放。洪洞方堆村有教友贩卖金丹判死刑，由于荷教士法春荣的一张名片子，该犯只出了二百小钱了事。马厂有地主閻贵生将一穷人害死，但由于荷教士翟守仁的周旋竟不偿命。

“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忿争，偶拂其心，教士则饰词上诉”（“近代史”337页）。贺广才于1895年6月13日给罗马报告说：“地方官在处理教友的案件上，非常关心，对待我们格外慈善”（“大事录”1893年，230页）。从此不难看出：帝国主义不仅强占民产，而且通过帝国主义势力压迫中国官府。

第四，情报工作：外国教士来中国往往改名换姓，昼伏夜行，专门搜集我国各方面的情况，给其主子做报告；关于人口数字，地理情况，语言气候，都在他们搜集的范围之内。他们的这些滔天罪行，已

使中国人民痛恨万分。即以义和团运动来说，“传教士认定了拳众运动是一种‘叛逆’，竟鼓励教民准备武装抗拒，常常无缘无故地侵犯义和拳”。另一方面扩张形势，给驻京公使虚报情况，当时“美国公使康格根据这些虚伪的扩张报告，也就压迫清政府遵命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清政府撤换毓贤，任用更大的屠户袁世凯做山东巡抚，要他来完成屠杀义和团的血腥任务”（“近代史”341页）。因此才激起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传教士”更大的仇恨。加以八国联军以义和团“难为教会”为借口，于6月17日攻陷大沽炮台，同时还企图要攻到有教堂的每个地区，以此实现瓜分中国的阴谋。这一来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不得不向敌人开刀。

## （二）义和团在山西的动态

山西的义和团是1900年山西巡抚毓贤所发动。毓贤原来是一个镇压义和团的著名刽子手。1899年一年中，毓贤在山东

曹州就殘杀了义和拳民二千多人，当义和拳改“反清灭洋”为“扶清灭洋”之后，毓賢才承認了义和拳为义和团。1900年3月，“毓賢被任为山西巡撫，英德公使曾提出抗議，而康格的态度尤其严厉，不仅認为是‘敌意的’行为，还說‘煩惱是会随他的委任而来的（“近代史”366頁）。“且要求毓賢将来的任用，不得在有傳教士的地方，”（同上367頁）。“所以毓賢到山西巡撫任后，对教士格外仇恨”（“近代史”366頁）。对这事帝国主义傳教士自己也是承認的，如林茂才在“致命录”中写道：“毓賢恨欧洲人以至于死，是因为洋人們把他告在西太后面前撤去了他巡撫职位”（“致命录”11頁）。毓賢調任山西巡撫以后，就立刻組織义和团，同时發动群众揭露洋教士利用宗教和教徒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一来，多年受外国教士和教徒欺压的山西人民，都紛紛起来高喊“扶清灭洋”，参加了义和团。虽

然如此，义和团在山西初期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仅仅想讓教士退出中国，教徒脱离教会并无伤害人命，毀坏教堂的行动”。毓賢于5月13日还接見了山西助理主教富方济各并給他表示的是，“恨英国人德国人及一切干坏事的欧洲人”，以后又差人到教堂說：“你們不要怕。对你們没有什么恶运”（“致命录”27頁）。就是在毓賢公布光緒皇帝的諭示上，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点，毓賢說：“我接到皇上驅逐欧洲傳教士各归本国的命令，立刻敬重执行，希各县地方官立刻将所有欧洲人全数遣發归国”（“致命录”16頁）。但是外国教士对毓賢早有成見，認为这些話是“欺騙”，竟在各地組織武装，准备杀义和团。加以“八国联軍”于6月17日已将大沽炮台攻陷，大有侵犯太原之势，这才激起人民群众的义憤。从以上这些事例看来，义和团所以杀教士燒教堂，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

抗。帝国主义硬黑白顛倒地吧中国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說成是“教难”，完全是一种誣蔑。

### (三) 山西“傳教士”对義和團的态度

洋教士在跟着帝国主义大炮来中国时，都打着“为归化坐在死影中的人們”（1895年9月18日晋南主教給羅馬的报告）和“情願舍身致命，为主牺牲”的招牌，且把“拯救人类为主牺牲”当成自己的光荣任务，一旦逃脫中国人民惩办时，还要假惺惺地說：后悔失掉了早以盼望的“致命花冠”（“山陝教史”102頁）。但是从庚子年在义和团反帝斗争时山西洋教士的言行来看，不难看出他們所打的招牌完全是假的。庚子年义和团运动时，在山西全境有意法荷等国的傳教士42名。如果說这些教士来中国是“专为牺牲，荣主救人”的話，在他們認為是光荣牺牲的时刻，就該效法救主耶穌如羔羊赴杀場一声不响

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但事实却相反，42名教士中，大部分抱头鼠窜，逃之夭夭。事实很清楚，他們根本不是为“荣主救人”，而是跟着帝国主义的洋槍大炮进入中国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如在1844年山西教区成立时，山西只有洋教士5人，中国神父16人，（“山陝教史”102頁）到1900年在不平等条約保障下，进入山西的洋教士猛增至42人，还不包括同年在太原病死的三人在內，从此不难看出傳教士的增长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张狂是相付相成的了。

从另一方面来講，傳教士之所謂荣主救人，为主牺牲的說法，都不外是为了欺騙而已。庚子年时他們到处組織武装与起义人民战斗。如洪洞韓岁堰，潞城南天宮和馬厂都組織了武装，而且是当时晋南的副主教荷蘭人翟守仁直接指揮领导（翟守仁給羅馬的报告：“大事录”1900年，173頁）。同

时还有一个荷蘭馬教士在馬厂对教友說：“义和团来了好好用槍打”。在晉北教区，“清源六合村曾以武裝正式与义和团开火，把义和团杀死400有余”（傅安多尼給羅馬的报告：“大事录”1901年，175頁）；就是太原主教座堂也曾經要以自有的武器組織武裝对抗，“当时所有的人，都拿起了准备好的战争武器和刑具”“因为艾主教許可武裝自衛”（“致命录”29頁），“只因富主教知道毓賢了解天主堂沒有足够的武裝准备”（“山陝教史”115頁），才裝作好人說：“我們不拿武器，因为我們是好人，随天主的聖意吧”（致命录”28頁），“把武器暂时藏到井里”（“致命录”29頁。）为什么这些自称舍己救人，只望天堂报答的傳教士，有天堂不升反而要拿起武器来杀中国人呢？有人說：当时教士的武裝組織是为了“自衛”，試問：耶穌傳教时是否也以武裝“自衛”过？即

使說“武裝自衛”是对的，那么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領土上武裝起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自衛”呢？还是外国傳教士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組織武裝以杀害中国人民是“自衛”呢？現在我們再听听外国“傳教士”在当时供詞中的一段。当毓賢审艾士杰时說：“現在我要杀你們洋人。”而艾竟蛮横无理地露出其本来面目答說：“現在你杀我們洋人，将来我們洋人要杀你”。在毓賢审富方济各时說：“現在我要把你們杀光”，富竟答說：“若你把我們杀死，对你这条大罪，是不会饒恕的”（“致命录”54頁）；当敏賢再次审雷体仁时問“你是那国人？”雷态度傲慢地答說：“我是大意大利人，愿意或不愿意我总是大意大利人”（“致命录”56頁）。他們死在临头，还没有忘了洋兵要来杀害中国人民，还没有忘了他們的国家。誠然，他們忠誠地完成了为其本国侵略中国服务的任务。在他們

死前，八国联軍已經攻陷大沽砲台，而在（7月9日）他們死后不久，7月13日天津失陷，8月14日北京被占，“华人死伤甚多，街上死骸枕借”。当时还有人要叫洋兵来太原杀害山西人民。虽然洋兵沒来太原，但是山西人民受的損失是莫大的。自此以后，山西帝国主义的势力是更大了，直到解放前，山西全境已被德、意、荷、比四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他們的100余名傳教士所瓜分。

#### （四）義和團運動后的洋教士

英国牧师舒威斯曾說：“牺牲者的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种子。他們用教会及本地教徒作挑撥的代理人，遭禍和牺牲是其政治上的胜利”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408頁）。只要回顧一下在帝国主义“护教”阴谋下，十九世紀后半期所發生的各个教案，可說不計其数，由第二次鴉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前夕，

（1856年——1898年）四十二年期間，重大的教案有47件，在每次教案以后，帝国主义就向我国压榨掠夺一次。如广西“西林教案”是英法联軍向中国侵略的口实，山东“巨野教案”是德国占据膠洲灣的借口”。庚子教案發生以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更加万恶。本来在庚子教案發生以前，帝国主义的砲艦早已开到太沽，及至大沽失陷，这才引起“教案”，但是帝国主义却借口“庚子教案”，为八国联軍进攻北京的根由。

联軍之役对我国各方面遭受的損失是不可估計的，如“聖教史略”記載着說：“凡寺觀与王公府第，曾設拳坛者，皆举火焚之”，“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軍势力圈内，往来梭巡，足迹殄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則焚毀，往往全村遭劫。“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数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極重



大无疑。“被杀拳众，其数当倍于遇害教民”。总之，联军所到地区，烧毁、惨杀、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尽管如此，当时山西洋人还要求联军来太原“示威”，虽然联军未曾来太原而山西所遭受的灾难，并不逊于其他各地。从下面所举事例，便可看出帝国主义是如何凶狠了。

联军侵占北京之后，“各国要求十二款，内有赔偿各国人及教士教民所受公私各亏；

“戕害凌虐各国士民之城鎮停試五年”，等等。“赔款按中国人口数每人罰銀一兩，凡四万万五千万兩，是謂‘大赔款’，其他各省焚毀之教堂与教士教民之屋宇等等，由地方官就地筹款，与教士商酌赔款”（“聖教史略”552頁）。当时山西天主教一面派人去北京参加与訂立“辛丑条約”，一面派晋南教区荷蘭人席(神父)，和晋北教区刘博第与地方官交涉“赔款損失”，在太原进行交涉的滿清政府方

面有“新道台沈敦和、教会方面有教区的宗座总理安怀珍。

1901年刘博第奉意国領事命駐太原办教案”（“鳳主教”19頁），

“向洋务局道台沈敦和交涉要占山西全省士子最高学府令德堂書院”（址在后小河南，）政府方面認為令德

堂書院是山西士子最高学府，有关全省国家人才的培养，表示不允，而刘博第正是为了关關这个学府，“停止文武等考試”，非要令德堂不可，

与此同时，刘博第又提出要小北門至小东門一大片土地，作为建筑之用，更无理的是提出要晋祠之水利和北門外的机器局等等。当时因道台无法应付，

安怀珍便亲到北京意国領事館与中国政府交涉，結果

“地方官被迫把最高学府令德堂讓出”（“山陝教史”121頁）。

及至鳳朝瑞来山西以后，还勒索了白銀兩万兩才把令德堂交还。同时为了表示帝国主义“胜利”，

以刻石留念来侮辱中国人民为条件。如

“議定为致命主教神父等立碑于猪头巷、大南門外和巡撫衙門西轅門外三处，刊刻主教神父姓名”（“鳳主教”43頁），以侮辱中国人民。

根据联軍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賠償各国人民及教士教民所受公私各亏”的要求山西外国教士毫不落后，首先对在所謂“大賠款”中，安怀珍和刘博第等向沈敦和提出要八百万兩白銀，沈以要求太苛，沒有答应，安怀珍脑羞成怒到了北京，要求意国欽差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只因意大利欽差和中国政府为太原早已議好，賠款为一百万兩，意欽差認為議定之后，不易反口，就这样看“意大利的面子”，一百万兩銀算为了事，而意大利領事館竟从中私吞了十五万兩；之后，意領事館仅以一套祭衣作为賠償（現在太原总堂过大占礼用的金色祭衣就是）。安怀珍又依据“地方官就地筹款，与教士商酌賠补”的“原則”，向山西“洋务局要求了

所屬五县的教徒撫卹費八万兩白銀，总堂生活費二万兩”。茲将地方官在教士的强迫下办理晋北教区各县賠款数字陈列如下：

- 1、阳曲县白銀300,000兩。
- 2、太原县白銀200,000兩。
- 3、榆次县白銀80,000兩。
- 4、祁县白銀40,000兩。
- 5、平遙县白銀10,000兩。
- 6、文水县白銀10,000兩。
- 7、永宁州白銀200,000兩。
- 8、宁乡县白銀100,000兩。
- 9、临县白銀80,000兩。
- 10、介休县白銀3,000兩。
- 11、汾州府和孝义白銀150,000兩。
- 12、忻州白銀80,000兩。
- 13、朔州白銀100,000兩。
- 14、大同白銀100,000兩。

总数1,455,000兩（“致命录”704頁）。

至于晋南教区有关賠款数字亦为数不少，茲不多贅。

帝国主义者勒索下中国人民的血汗錢，竟任意揮霍无所不为，如意大利教士包景星在

青龙鎮置房买地，把当地妇女娶为妻妾，刘博第在忻县靜乐大肆揮霍，无所不为。还有少数的地痞恶霸，所謂什么“教紳”的仗洋人势力，大發洋財。帝国主义分子在义和团运动后，不只發了財，而且升了官。如晋南教区荷教士翟守仁，因领导武裝杀害义和团有功，被羅馬提升为晋南主教，同时清朝政府亦授与了相等于巡撫品位的官爵，出入乘綠色轎有衛兵八人。总堂駐兵兩排早晚必吹号响炮，把天主堂变成营盘。即使从汉口調到山西的意大利人鳳朝瑞，“也沾了山西教友流血的光”，他来太原时会乘綠色肩輿，且有“洋务局总办、提督、杂佐等出迎”，（“鳳主教”20頁）。除此而外，他們为了向中国人民

“示威”，还在“賠补聖教会的名声”名义下，勒令地方官許可教友抬着聖母象进行一次大游行，地方官和教外人也被迫参加。

由于山西天主教在意大利“保护”和“支持”下进行了教案交涉，竟触怒了法国，因此安怀珍在教案结束后被撤职，返欧向法請罪，从此不难看出傳教士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效劳是如何卑鄙的了，“辛丑条約”以后，中国半殖民地状态更为加深，而天主教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則更加蛮橫而腐敗：霸占田产，包攬詞訟，侵犯主权，逞凶惨杀，勒索压詐，窩藏武器，間諜活动等等，比之庚子前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代邮

程策斌同志：請把你詳細的通信地

址告訴我們，以便联系。

本刊編輯部

# 皮漱石總主教給“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 在山西的罪行”一書所作的序言

山西省天主教友愛國會，為使廣大神職人員和教友徹底認清帝國主義分子在傳教的幌子下，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號召全省神職人員、修女和教友，廣泛地揭發他們的罪惡事實，根據揭發的一萬餘條罪惡事實，寫成論文，匯集成篇，付梓成冊，以資宣傳，意義頗為深遠。

溯自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隨着帝國主義侵略者進入中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違犯基督教旨，干着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勾當。如耶穌會士巴萊多，四百年前就曾鼓動歐洲各國王侯，以“擴大基督之國”為名，武裝侵略中國。另一個叫卡而內羅的主教，也“主張武力征服中國”。1574年，奧斯定會傳教士，拉達和馬林，陪同西班牙帝國的軍官，以考查科學公使名義，到我福建搜集

政治、經濟、軍事各種情報。

近百年來，帝國主義欺清朝軟弱無能，強迫清廷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如1842年與英帝國訂立的南京條約；1844年與美帝訂立的望廈條約；1858年與英法訂立的天津條約；1901年與八國聯軍訂立的辛丑條約等。而在這些條約中，由於帝國主義分子主教、神父的慫恿和策劃，都有一項傳教士不受限制的特權，甚至有“外籍傳教士在中國被害時，以縣令抵償”等等。他們以帝國主義軍艦、大炮為後盾，以這些不平等條約為護符，為所欲為。如：咆哮公堂，毆辱縣令，包攬詞訟，霸占土地，欺壓人民等，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解放前後，他們為帝國主義服務，作特務間諜活動，更是猖獗一時。他們受到梵蒂岡的指示和鼓勵，大力煽動神職

人員、修女和教友，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如帝国主义分子雷震远1946年組織“公教青年报国团”、“民众自衛队”、“青年戡乱救民先鋒队”等武装特务組織。在华北一带搜集解放区軍事情报，杀害干部群众。中国叛徒、教会敗类刁化仁（教友），吳雅閣（神父）1948年5—7月間，在平山、石家庄謀杀中国共产党首长未遂。八、九月間，兩次报告蔣匪我高級首长所在地，指引飞机乱炸平山，石家庄，炸死炸伤民众一百六十余人，炸毀民房七百余間。黎培里利用宗座代表名义，勾結蔣匪帮，参加反人民战争，掩护美国特务机关进行破坏活动；策划組織反动聖母軍，煽动中国教徒反对人民革命和人民政府，破坏各地爱国教徒的爱国运动。（以上五款是他在法庭自己签字供認的）帝国主义的罪恶事实，如果都匯集成

篇，那可真是汗牛充栋，高閣无隙。帝国主义分子来中国究竟是为荣主救人，还是別有用心，豈不昭昭在目。

山西省全体神职人員和教友，能大胆地、普遍地揭發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并写成批判文章，匯集成册，用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創举，一个有力的教育方式。将来推行全国，对我们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定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山西省神职人員、修女和教友，經過社会主义学习、整風、反右、向党交心，政治思想觉悟有所提高的具体表现，也是山西省天主教友反帝爱国运动的又一躍进，希望山西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积极带动神职人員和教友，在此躍进的基础上更加躍进！兴奋之余，聊書所感以为序。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 皮漱石  
沈阳总主教区主教

1959年9月12日

# 偉大呀，武鋼！

沙市 鄧澤茂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上午，我們湖北省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三个教派在省會武昌進行黨的總路綫教育學習的代表，來到我國的第二鋼都——武鋼參觀。我們坐的公共汽車直開進武鋼廠門後仍然不住地往前行駛。“這個廠有多大呀！怎麼要坐着汽車參觀！”我心里不住地在盤算。我在沙市不管參觀那個工廠不說一到門口就要下車，甚至有時一天連參觀幾個廠也是步行去的。是沙市的廠小嗎？這也不一定，象榮獲全國群英會紅旗的沙市染整廠，有幾萬錠子的沙市紗廠，年產十幾萬打的水瓶廠，還有……都是解放來，特別是59年大躍進和擴建的廠子，個個廠都不小。原來武鋼是太大了，竟比我們擁有14萬人口的輕工業城市的沙市全市還要大。

車停了，我隨着人群下車。出現在眼前的簡直是另一個世界：頭上盡是些大筒筒大管管，腳下到處都是縱橫交錯的鐵軌。聽來過的人講，頭上的大筒筒大管管是些什麼水道管呀，熱氣管呀，煤氣管呀，這管那管的一下子怎麼使人記得清楚！特別使我驚訝難忘的是：武鋼通過這些水道管每天所用的水，要等於武漢市所有人一口食用水量的總和的三天那麼多！不說我們沙市了，擁有九百萬人口的武漢市，是全國著名的大城市之一，一天該要用多少水呀，而還只能够武鋼用水的三分之一，不禁使我想到了：武鋼呀，你真是“海量”！要不是我們偉大的祖國有這樣取之不尽的長江，還不够你喝的哩！

隆隆的馬達轉動聲，嗚嗚的火車警號聲，和着一些配樂

似的較小的，远近不一的，时起时落的声音，簡直是一部永不停息的生产交响乐。身入其間真使人兴奋和激动。武鋼遍地布滿了小軌道，拖着原料或半成品的机車往来如梭，走路要加几分小心，不然随时都有碰撞你的危險。

好高的烟囪伸入云霄，75公尺高的高爐，比我們沙市最高的宝塔还要高得多，想来顧名思义，所謂高爐不但它的温度高，而爐身也是巨大的。

火花四濺，一条火紅的巨龙，像似山上的瀑布滾滾流入一个比楼高的大罐中。这正是——一号高爐在出鉄。200多人的心朝着它，200多双眼睛望着它。流呀流，鉄水不停注入一个大的罐罐。这罐能裝85—100吨，把它算成斤就是17万到20万斤！一个高爐一天要流8次，每次流它三四罐，算起来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号高爐日產2000吨以上，年產75万吨生鉄。

另外我們看了一个“翻料卸貨机”。好大的力量，它如

同一个巨人的鉄掌，机車把滿載原材料的車箱拖到它跟前，它张开巨掌，把車箱連貨物帶鉄軌，来一个大翻身，把車箱里的原材料倒出来，由地下輸送帶送到100米开外的高爐里去。这使人联想到神話故事里的“仙人掌”，但那究竟是神話，現在眼前看的却是事实，它力气又大，动作又快，每次要翻30—70吨的重量只用48秒鐘。

由于知識的貧乏，特別对科学技术知識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在这里面看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懂，对什么东西都說不上来。大，偉大，偉大得使人惊讶！也只能用这一句話来概括。在武鋼招待会堂里，武鋼交际处吳处长又作了有关武鋼的介紹，不！这就如同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躍进的課、总路綫教育的課。

武鋼是我們三大鋼都之一，年產300万吨鋼。它与年產600万吨鋼的鞍鋼及年產300万吨的包鋼產量合在一

起，組成了祖國年產1200萬噸鋼的雄厚的鋼鐵基地。這使我們對祖國鋼鐵工業發展的前途有了實際認識，從而充滿了信心。

武鋼包括18個工廠礦山，31個車間，共計49個單位組成。它是一個現在世界上最新型的鋼鐵聯合企業。不它生僅產鋼鐵，還要生產各種各樣的鋼材和各種機械，各種動力設備以及焦炭、耐火磚，等等。它還將提供石油、瀝青、化學藥品等重要原料。它的設備比美帝國主義的不但要新而且還大。以煉鋼平爐來說，美國現在最大平爐只能產360噸鋼，而我們的武鋼二號平爐就是爐產500噸，以後的幾號還要爐產600噸，將近美國平爐產量的兩倍。

武鋼廠址位於武昌的青山，但是這裡現在是一望平川，根本沒有山的踪影。原有的山被削平，附近原有的三個大湖也被填平了以後才開始了1957年的大規模施工，武漢鋼鐵

公司原定1964年建完，但在總路線的光輝引導下，一躍再躍，預計1961年即可基本完成。在施工過程中，處處體現了總路線，大躍進的精神，比如100公尺高的三個煙囪，第一個180天建成，但第二個僅用了36天，後來的就只用12天的時間便完成了。

通過這次參觀，使我廣開了眼界，更加相信超英趕美不是什麼登天的難事；美帝國主義搖頭震角的日子永遠過去了。同時，武鋼這樣龐大的鋼鐵聯合企業的迅速建成，反映了中國工人階級沖天的革命干劲和忘我的勞動熱情，體現了總路線、大躍進無比強大的威力。像武鋼這樣偉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在我們祖國不斷壯大和發展，不僅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可靠的物質保證，而且將大大有利於鞏固世界和平。為此，我不禁要為我們的祖國六億五千萬英雄的人民，為偉大而光榮的中國共產黨感到驕傲和自豪！



# 人民公社好得很

## ——參觀長安縣樊川人民公社的感想

· 高宗才 ·

我和西安各界青年45人于去年十二月下旬赴長安縣樊川人民公社王莽管區參觀學習了一個短時期。這裡人民的巨大變化，使我感到驚喜；這裡的一切都標誌着黨在領導農村工作上的光輝成就。

王莽村在解放以前共196戶，30%以上都是貧雇農。由於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其中的170戶，每年程度不同的缺少糧食吃，17戶討飯，80戶炕上沒被子，30戶蓋的是口袋片子，40戶冬天沒棉衣穿，有4戶為生活所迫賣兒賣女。

解放以後，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特別是建立起人民公社以後，王莽村的生產顯著提高了，經營範圍不斷擴大，社員收入不斷增加，大家過起美滿幸福的生活。樊川

公社的生產量是逐年增加，夏田平均畝產：五七年為158斤，五八年為210.12斤，五九年為248斤，五九年比五八年增長17%，比五七年增長52.4%；樊川人民公社秋田平均畝產：五八年為210.12斤，五九年為350斤，五九年比五八年增長17.9%。

在公社建成以後，水利建設更是突飛猛進：樊川公社今冬組織了6300多勞動力，修建了大小十多個水庫。我們參觀的藥王廟與藥王洞兩個水庫可容水100萬立方，可灌溉3000多畝土地，同時可以保持水土流失，調節氣候，發展漁業。

人民公社化以後，建立了許多工廠，象造紙廠、機械修配廠、面粉廠、木器廠、石英石廠等。其中僅機械修配廠就有工人100多名，有三個大車間，生產都是機械化半機械化的。

这些厂子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起来的。它们不仅生产了大批农具，保证了农业生产，而且给四大厂加工零件。五八年建厂时全部积金只有44万元，经过59年一年，已有积金82万元。这充分证明了党提出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方针的正确。此外，我们还参观了樊川公社的园艺场，这是在一九五六年一片荒草石滩里开辟建立起来的，现在面积已达950亩，计有苹果4000株，葡萄200株，水蜜桃400株，梅荔50株，柿子600株，还有各种苗圃40亩，可出苗361,000株。另外，今冬开始养猪123头，奶羊40只，他们的理想是要在一两年内，实现万头猪、千只羊。根据当地条件，加上他们的不断努力，我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到那时，樊川公社所在的中南山下，将是果树成林，猪羊遍山。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富裕起来。

公社的文教事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樊川公社今年在校的学生由原来的8219人增加到8887人，适龄儿童全部入了校；农业中学也由5个班发展到8个班。公社还成立了电影放映队、文化馆。管区都有文化站、广播站和邮电网。仅王莽管区，学生由过去361名增加到1301名，增长了2.77倍，其中中学生由9名增加到175名，增长了18.4倍，还有9个大学生。

随着集体所有制的發展，相应地發展了社员的福利事业，举办了以食堂为中心的托儿所、敬老院等。我们参观樊川公社第一敬老院时，看到每个房间都生着炉火，老人们过着很舒适的生活。

目前，全体社员是正在继续鼓足干劲、辛勤而愉快地劳动着，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正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奋勇前进。

# 蔣伯娘——勤儉持家的能手

桂林——沈鵬軒

蔣伯娘（本名叫唐菊元）是桂林市白龍公社江南巷的居民，在這一帶提起她的名字，人人知曉。她是全市居民中的紅旗手，又是一位虔誠熱心的教友，今年68歲。她一貫響應黨的號召，勤儉持家，厲行節約，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五八年，黨號召全民大辦工業，蔣伯娘一聽說，全國要搞工業化。心裡就樂開了花，興高彩烈地在街道上一次就投資100元，還買了一百元公債。不僅如此，去年市愛國會向全市教友發出踴躍投資，支援國家工業建設的倡議後，她熱烈響應，投資20元，並說：“我一聽要辦工業，有時樂得連覺都睡不着。办好工業，人民生活才会过得更好。”

在解放前蔣伯娘的生活很苦，過着缺吃少穿、飢一頓飽一頓的生活。舊社會的殘酷剝削使她喘不過氣來，何況還要負擔六口人的家庭生活。解放後，黨和政府關心她，支持她搞生產。她每年都要養五、六頭大豬。別人說養豬是賠本貨，但她却不以為然，因為她養豬不花本錢，到處去找能給豬吃的青草，或跑到菜市場、交易所拾些爛菜爛葉喂豬，甚至連煮食的燃料都是拾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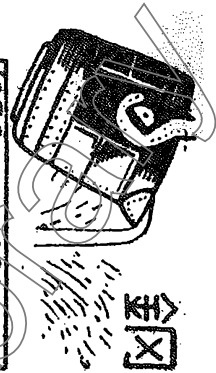
我去訪問她的那天傍晚，她才把豬飼料弄好，自己未吃晚飯，便興致勃勃地和我談了起來。她說：“我要不花錢在短時間內養出一頭五百斤重的大豬”。說着，她就拉着我去參觀了她的大豬（這時已有300多斤重），及大堆的豬料、青草、樹葉。她接着又說：“六〇年我要養出衛星豬（指上千斤），要用更大的成績，來報答黨和毛主席”。蔣伯娘不單是工作積極，創出了成績，對政治學習和各種會議也都積極參加，一馬當先，晚上還堅持積極參加“五防”保衛工作。

不久前蔣伯娘被評為桂林市居民紅旗手，真是莫大光榮！



### 铁壁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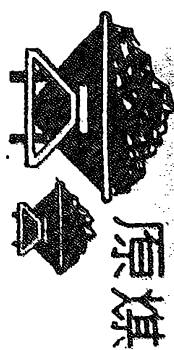
解放前数十年中，美帝国主义一直不断地劫夺和破坏我国的文物，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损失。这些被劫夺的文物都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内。现在，美帝国主义又要把我国在全国解放前夕被蒋介石集团盗运到台湾的文物劫往美国。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决不容许外人盗窃。



钢

1050—1200万吨

1335 万吨



原煤

10000—21000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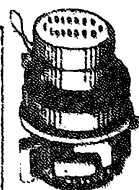
34780 万吨



发电量

400—430亿度

415 亿度



发电设备

140—150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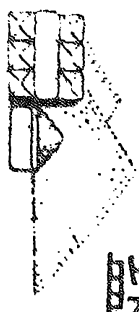
215 万吨



冶金设备

3—4 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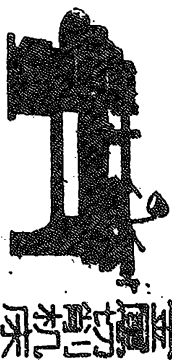
20.5 万吨



盐

1000—1100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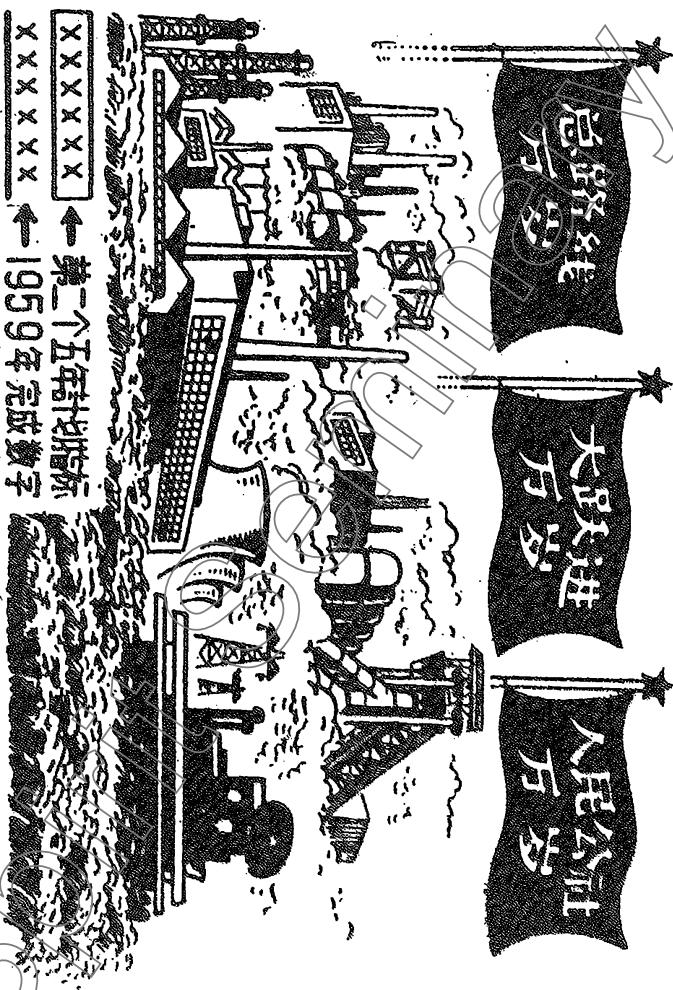
1104 万吨



金属机床

0—0.5 万台

7 万台



粮食

5000亿斤左右

5401 亿斤



原木

3100—3400亿立方米

4120 亿立方米



棉纱

000—900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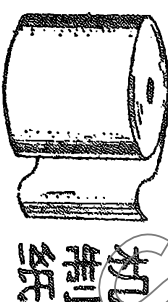
825 万件



棉布

72.9—80.8亿米

75 亿米



机制纸

150—160 万吨

170 万吨



棉花

4000万吨左右

4820 万吨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